

維高斯基、傑佛遜和杜威 在教育上的類似觀點

蘇永明 譯

在本文中，我將比較維高斯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 1896-1934)和兩位同樣主張文化--歷史研究法(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的美國思想家。此一比較不是要張揚或貶抑維高斯基的貢獻。相反的，是要探討他們在大方向的相同點和不易察覺的差異，我希望能增進對文化-歷史研究法的瞭解，以及找出在美國的教育思想中的類似觀點。本文也可能在比較後提出社會-教育之間互動的新境界。比較時，我有時將維高斯基與傑佛遜和杜威加以並列，使用半平行(semi-parallel)的方式來處理。其他時候，是從維高斯基的角度來看待另外兩人的理論。

提升判斷能力的教育

我會把維高斯基、傑佛遜、和杜威的理論拿來比較，是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多次到莫斯科訪問的結果，時間可追溯到蘇聯時期。在蘇聯解體後，許多在俄羅斯的同僚-他們都是在學術界維高斯基的再傳弟子-急於去將維高

本文譯者為新竹師院初等系教授；學術專長為英國諾丁罕大學教育學博士；教育哲學、教育史、現代與後現代教育理論

斯基的理論所蘊涵的教育學應用到俄羅斯的幼稚園和中小學裡。雖然維高斯基式的教育學在俄羅斯的實驗學校尚為政府所容忍，但卻還沒有廣泛的影響力。我的俄羅斯同僚抓住這個機會，想要擴大其影響力；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在將維高斯基的理論推行到俄羅斯的學校，目的不在測試此一文化－歷史研究法的教育學之可行性。他們把這種推廣當做是對老師的增權賦能(teacher-empowering)，他們認定，當老師們採用維高斯基的教育學時，就是在形成一種社會－政治改革。他們在科學上的興趣，是去探究社會如何形塑心靈的過程，但是他們的社會－政治方面的興趣，卻在於培養一個有教養的心靈，使未來能免於極權的統治，且增進朝向民主的力量。學校教育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也是傑佛遜和杜威所關心的，這些俄羅斯的伙伴對於教育改革所持的立場，讓我想到傑佛遜和杜威。我認為他們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因此促成了本文的撰寫。

本文的比較主要有三個核心點：(1)「社會的」或「社會機構」現象；(2)個體間心理(interpsychological)和個體內心理(interpsychic)現象；(3)把兒童的心靈當做是文化－歷史、社會生物學的存在。傑佛遜、杜威、和維高斯基對上述三個論點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社會的」或「社會制度」現象

傑佛遜／傑佛遜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維吉尼亞州州長、和第三任美國總統，他深入地參與了社會制度的運作。他很明顯在歷史上受到批評，包括參與奴隸制度、對美國印第安人的傷害，而且延續歐陸十八世紀以來的傳統，不給女性和無財產的男性選舉權。儘管有這些錯誤，他仍舊是在美國歷史中，鼓勵一般公民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的奠基者。各種擴大人民參與政府事務的社會－道德原則都是出自於傑佛遜的筆下。

傑佛遜身為政府機關的一員，深深地關切權力濫用的誘惑。他把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這方面的言論抄錄在自己的箴言書中：「許多經驗顯示，每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傾向於去濫用，要把他所擁有的權力發揮到極致…爲了要消除這種濫用，有必要從事物的本質出發，即權力要有相對的權力來制衡」(法意，xi，第四章)。傑佛遜相信有警覺性和有能力的選民是制衡政府官員權力的最終利器。他在1787年承認「如果人們一旦不去關心公共事務，

你、我、和國會、選舉人團、法官、和州長都將變成狼。雖然可能有個別的例外，這就是人們的本性。」(Letter to Edward Carrington)相較於林肯的名言，他也寫下了類似的觀點，他說：人們「可能偶而或不小心中會犯錯，但不會有意或是有計畫的要推翻維護人民自由的原則。」(Letter to M. Coray, 1823)林肯後來說「你可能騙某些人一輩子，也可能某些時候騙某些人，但你不可能隨時把所有人都騙了。」

傑佛遜對於兒童的文化－歷史發展的興趣就在這裡。他相信，一般人需要一些教育，目的在確保當他們做為選民時，會做出明智的集體選擇。我將傑佛遜對於社會制度的觀點按時間先後加以摘錄。這些言論顯示他相信民主共和的社會制度必須奠基於受過教育的大眾。在1789年他寫到：「當人們被充分告知時，他們就會相信他們的政府。」(Letter to Richard Price)。1816年，他寫到：「只要將一般民衆啓蒙，暴政、和對身心的壓迫就會像鬼魂在天亮時逃逸無蹤。」(Letter to Pierre Samuel Dupont de Nemours)1820年，他寫到：「如果我們認為一般人還不具有做正確決定的智能，補救之道不是去剝奪他們的決定權，而是要去教育他們，使他們具備此一能力。」(Letter to William C. Jarvis)1823年，他寫到：「當人們受到適當教導後，對公共事務的態度才是安全的。」(Letter to M. Coray)(可能傑佛遜認為適當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在政治上仍未變成具體措施。他無法說服他的維吉尼亞州州民建立公立學校)。

根據傑佛遜的想法，是任何的教育都可以達成民主共和的需要呢？或僅限於某種教育經驗才能達成此一任務？當然，杜威對於怎樣的教育才能滿足民主社會的需求有許多看法。那傑佛遜呢？值得注意的是，傑佛遜在他的著作中，確實談到他對所謂的民主共和的課程的看法。他在美國獨立戰爭四年後所寫的一封信中指出：「就一個美國人而言，接受外國教育的結果令人感到擔憂…放眼美國看一看。誰是最有學問的人，口才最好，最爲人民所鍾愛，最爲人們所信任和支持呢？這些人必須是受過教育，而且他們的舉止、道德、習慣都要跟這個國家完全吻合才行。」(October 15, 1785, Letter to John Banister, Jr.)[這聽起來有些排外，但要知道當時大部份在國外受教育的美國人都是到英國留學，而美國這時才剛擺脫英國的殖民而獲得獨立。]

早先，傑佛遜顯然想把自己對歷史的博學再製到每個公民的身上。他在1782年寫到：「閱讀[應該]以歷史爲主。歷史，一方面是要知曉過去，也要讓人們能夠判斷未來；要讓人們知道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家的經驗；讓人們足以判斷行爲的意義和目的；它應讓人們足以識破各種掩飾下的陰謀；並且去對抗它。」(1782, Note on Virginia)這是傑佛遜對於課程中歷史占有優先重要性

的主要言論。也有許多地方，他談到科學的重要性(1795,1805,1810,1821,1822)，認為科學足以捍衛自由、抵抗外侮，和「它與權力、道德、秩序、幸福等同。」在1805年，他希望「此一程度的學習[應該]要求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人都做到，促使他們能閱讀、能判斷和投票時知道整件事的意義。」(Letter to Littleton Waller Tazewell)1824年，他寫到：「在共和國中，其公民應依理性(reason)、說服而行動，不是靠武力，論辯的能力(art of reasoning)變成是最重要的。」(Letter to David Harding, 1824)

傑佛遜的著作顯示他對統治的過程和必備條件相當嫻熟。從這個角度出發，他確認了社會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是可以經由他所夢想的公共教育來達成。他很少特別去談到社會制度的運作過程將對個人發展有何影響，或是去注意個人發展如何影響社會。

杜威／杜威不像傑佛遜在政府機關服務，但他和傑佛遜一樣相信，民主社會的運作有賴於對兒童的教育。在杜威所寫的「教育做為一種社會功能」這一章裡，他說：「我們認定社區或社群是經由不斷地自我更新(self-renewal)來維繫，而這種再生是經由對社會中未成熟份子進行教育來完成。這些活動是經由不同的單位、有的經過精心設計、有的是無意的，一個社會將原先未有導向和看起來像是局外人的部份，轉化成建構社會理想和資源的中堅份子。」(1916，民主與教育，第2章)。

因為杜威寫了一整本書(民主與教育)來調和民主社會中的教育與生活，我不打算全部列舉出他的觀點。他將社會分成「植基於習俗」(based on custom)和「進步社會」(progressive society)兩種，杜威指出進步的社會「極力要去塑造其年輕人的經驗，不是要再製當前的習慣，而是較好的習慣，如此未來成人社會才會比目前好”(1916，民主與教育，第6章：保守和進步的教育)。在讚揚個別差異時，他寫到：「一個進步的社會非常珍惜個別差異，因為它會在個別差異中找到社會成長的方向。因此，一個民主的社會必須堅持理想，在教育上允許智能上的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和各種特殊才能和興趣的發揮。」(1916，民主與教育，第22章：個人與世界)雖然承認「智能上的個人主義…在觀察、想像、判斷、和發明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杜威卻拒絕「道德上和社會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和可能性(1916，民主與教育，第22章：個人與世界)。

杜威說明了個人與社會的雙向關係，即社會影響個人的文化－歷史發展，及個人反過來影響社會的過程。因此，他的觀點比傑佛遜的要完整。

維高斯基／各位應該都知道維高斯基提出很有名的觀點，Yaroshevsky

(1989, p.138) 把它叫做超級任務(supertask)：掌握個人與文化之間的本質。事實上，維高斯基談個人發展與社會主要的政治和道德認同(如共產主義)之間如何互動，大部份西方人都不熟。目前對於馬克思主義在維高斯基的心理學是否占有核心地位，正進行相當大的爭論(Jorsky, 1987；Kozulin, 1990；Yarissevsky, 1989；Wertsch, 1985, pp.10-11)。我個人相信Luria在這方面的判斷，他說(引自Wertsch, 1985, p.11)「維高斯基是我們之間主要的馬克思理論家。」本文所缺乏的可能是他的著作沒有英文翻譯，而無法摘錄前述像傑佛遜和杜威的類似觀點：也就是說可以把維高斯基對文化－歷史方法心理學解釋為是對前蘇聯時期的教育傳統之修正，並培養出較適合蘇聯社會的兒童。很矛盾的是，今天如果把維高斯基的心理學解釋成是在修改蘇聯的傳統，以培養兒童適應後蘇聯的俄羅斯社會將會是更合適。

無論如何，維高斯基對於兒童的文化－歷史、社會生物的發展和個體間的心理過程，提供了許多詳細的心理學解釋。在這方面，傑佛遜就很少談到。

個體間心理現象

傑佛遜／傑佛遜並不是完全沒有談到個體間的心理現象。他與後來杜威與維高斯基的理論有部份相呼應，認為人類是自然地傾向於去適應所處的社會。他指責盧梭在愛彌兒一書的社會教育計畫，傑佛遜寫到：「我相信一般人性是良好的。我認為人們是在社會中形成，且在本性上就能適應社會。」(1799, Letter to William Green Mumford) 在談到模仿時，傑佛遜的用詞與Merlin Donald(1991, pp.168-177)最近對於模仿技術(mimetic skill)的定位很像，認為模仿是知識的社會共享之先決條件，傑佛遜寫到：「人是模仿的動物。此一特質是所有教育的根源。從搖籃到墳墓，他都是在學他所看到的別人怎麼做。」(1782, Notes on Virginia)傑佛遜的說法沒有甚麼特別，但與維高斯基的體間心理現象相符合。在1822年，傑佛遜大致採用了維高斯基的方式來診斷一個教育問題。他宣稱，問題的產生就是[兒童的行為]與父母親所教的相反。他在1822年的著作有言「訓導一直是美國教育最難達成的。過早強調獨立、父母太少管教，造成了不服從的態度，這是對科學的一大障礙，也是革命以來腐敗的主要原因。」(Letter to Thomas Cooper)

杜威／杜威和維高斯基對於個體間心理現象的觀點不同。他們兩人都把這個概念各自放到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和理論架構。在閱讀他們各自的觀點時，會假想如果他們能對話將會是多麼令人驚訝。雖然我在還沒有讀民主與教育之前，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先讀過1962年版的思想與語言，我當時沒有注意到兩者有這麼多相類似之處。現在讀過維高斯基的著作和其他有關文化－歷史方法的文獻後，我發現此一方法與民主與教育有這麼多類似之處，確實令人感到驚訝。

我們的問題是要去找出年輕人如何能吸收年長者的觀點，或是年長者如何將年輕人塑造成具有與他們類似的心態。一般而言，其答案是：經由環境的作用來引發某些反應…“環境”和“媒介”指的是比個體周遭事物具有更多的意義。它們指涉的是個體主動、持續與之互動的對象。

…第一步是建立一些情境，來激起看得見也摸得到的具體行為模式。即促使個體變成一個共享者，或是合作者，以便在協同的行動中感受到，共同行動的失敗就是他自己的失敗，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這已完成了第一步。只要他具備了族群的意識，他立刻警覺到有一種共同目的要完成，他就會運用各種方式來達成。換句話說，他的信念與想法，與族群中的其他人是類似的，他獲取與他人一樣的知識，因為那些知識是他經常在追求的。

我們據此可以得到結論，語言之所以可用來傳達並獲得觀念，乃是因符號之獲得意義，是在共享的經驗或共同的行動中使用的結果。語言的使用，不能違背此一原則。當文字未能進入人們共享的經驗時，不管是指涉外表的具體事物或指涉內心的想像，那些字只是一種物理刺激而已，既不具意義也不具智能上的價值。(Dewey, 1916, 民主與教育, 第二章, 教育做為一種社會功能)

不管是傑佛遜或是杜威都沒有對心理運作的過程提出像維高斯基那樣的解說。本文的比較不只是因為個人的偏愛。而是要找出其共通點並注意到教育措施的新的可能性。

由於篇幅和時間的限制，本文對於個體間心理現象的物理背景較少提

到。就像Michael Cole所描述的，「人們在面對環境時，掛念的就是如何修改以往行爲，以適應新情境的改變。」(1996, p.59)傑佛遜似乎從未考慮到這一點。做爲改進型具和伸縮繪圖器的發明人，傑佛遜可能和其他的發明人一樣對於確認新事物的形式與使用竅門有相當的興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應該會被維高斯基的論點所吸引。

兒童的發展當做是文化 —歷史和社會生物的存在

傑佛遜／傑佛遜可能未必同意維高斯基所認定的「兒童行爲的歷史是由[生物根源的基本過程]和[社會文化的高級心理過程]交織而成」(Vygotsky, 1978, p.46)。傑佛遜顯然承認生物過程對發展有影響，這可以從他對天才不是普遍存在的觀點看出。他顯然也承認社會—教育的過程對發展有影響，教育可以培養智慧和型塑心靈。傑佛遜在1782年寫到：「經由從窮人階級的小孩中挑選出聰明者，我們希望爲本州培養出大自然本來在窮人和富有者之中就賦予的天才，但這些人若未加以培養就會消失掉。」(1782, Note on Virginia)三十五年後，傑佛遜談到類似的觀點，但是以國際競爭的架構來說明：「[我的教育法案]之目的是要將每個國家中因爲貧窮而埋沒的天才開發出來，而就照我國的人口比例，每個國家將會增加兩倍或三倍的人才。」(1817, Letter to M. Corres de Serra)然而，根據前面的敘述，傑佛遜缺少維高斯基那種生物個體與社會—文化互動、滲透、影響的概念，並以之構成主要的「社會—生物人格發展的主軸」(引自A. S. Smirnov, 1966, trans.1973)。

杜威／就像他實用主義的同僚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亞當斯(Jane Adams)，杜威把人類經驗(包含認知)當做是發展性的、依時間順序而發展的過程。在他所強調的社會—文化的發展脈絡來看，杜威和維高斯基差異不大。然而，杜威沒有像維高斯基那樣，強烈的主張社會—生物的互動論。儘管杜威很喜歡強調生物方面的起始點，他仍舊認爲生物的過程對於社會—文化的活動無法有效反應。

脫離情境

以下的論點是岔開本文原來的論旨。傑佛遜、杜威、和維高斯基都認為，人們能將具體事物加以抽象、脫離情境而在理論上把它類化(*generalization*)是人類在文化上的重要成就，也是由教育加以促成的。可是，理論上的類化——它們的可信度和價值——在今天看起來卻是值得懷疑了。

後現代(*Postmodern*)拒絕承認理論上的類化，至少認為任何這種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或是科學理論上的真理宣稱(*truth claims of scientific theories*)是有問題的(*Foucault, 1980, Hassan, 1987*)。傑佛遜所預設的基礎主義一定會受挫於後現代。杜威的實用主義認定，任何決定何為真理的認知標準都會受到當時所追求的目標和價值所影響，這樣的說法已預示了與後現代同樣的立場。就像 *Wertsch(1985, p.229)* 所辯稱的，維高斯基的理論可以和巴赫丁(*Bakhtin*)所代表的後現代接軌(就像表面上是價值中立，事實上當事者早已受其所處的社會——歷史脈絡中不言自明的信念體系所左右)。

維高斯基的作品尤其能產生有趣的觀點，從不同的角度來參與挑戰今天大家所攻擊的理論上的類化。其挑戰的出發點是認為許多系統都太複雜了，無法像數學的系統那樣的明確和簡約(引自 *Davild Berlinski, 1995, p.307*)，「在指出數學科學(*mathematical science*)有那些力有未逮時，等於是要採用第二種智能上的策略，此一策略將更深入，而不只是求適當的描述……在生物學中，一直無視於最終原因及最基本的構成元素(*irreducible constituents*)——沒有生物學者在解釋蝙蝠的新陳代謝時，會採用夸克(*quarks*)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要找出各種關聯和互相影響的方式，以期瞭解生物系統的運作方式。」*Berlinski* 接著指出，生物學者關心互相依賴的密切網路確實太複雜了，以致無法釐清。*Berlinski* 他樂觀的認為，電腦(使用神經網絡和其他路徑搜尋的工具)可能幫忙解決觀察上的溯源，去整合直接觀察的結果，「不採用理論當中介，也不訴諸抽象概念」(*p.380*)。雖然這樣的樂觀有點幼稚，*Berlinski* 已採用文化——歷史的步驟到電腦裡——不是當做一個數字的踏板，而是一個連接的補鑲劑(*connectionist prosthetic*)——這是維高斯基所認定的思考工具(*tools of thinking*)。